

满腔热血捍卫不灭的信念

——《共产党宣言》首译本保存记

光辉历程

在“白色恐怖”的笼罩下、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，哪本书承载着怎样的理想与信念，值得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？山东东营广饶县刘集村共产党员的回答是：《共产党宣言》、马克思主义。

1975年，文物工作者来到刘集村征集革命文物。村民刘世厚提及自己仍保存着当年大伙学习“大胡子”的那本书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经过一番劝说与动员，刘世厚捐出了珍藏40多年的《共产党宣言》首译本，也揭开这个鲁北农村学习、传承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段往事。

20世纪早期，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国内五四运动的展开，马克思主义逐步在大江南北落地生根，为寻求民族独立、国家富强的中国带来新希望。《共产党宣言》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标志，中文全译本的缺失却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心结。

1920年8月，经过数月紧张工作，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在上海正式问世。但由于排版疏漏，封面书名《共产党宣言》被错印为“共产党宣言”。这约1000册的错版书，遂全部赠阅。有一些就随着次年参加中共“一大”的代表们奔向各地。

1926年的正月，在济南工作的共产党员刘雨辉回到家乡广饶县刘集村省亲，临别前将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首译本赠与族中的共产党员刘良才。此时的刘良才，已在前一年建立中共刘集村党支部，并担任第一书记。

刘良才的孙子、75岁的刘奎湘老人告诉记者，由于首译本封皮印有一幅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，当时的刘集村人更习惯称其“大胡子”。人们把《共产党宣言》叫做“大胡子的话”，本名倒少有提及。拿到这本书的刘良才如获至宝，经常与支部成员一同研习。为避人耳目，用棉被掩住窗户，点起豆油灯，让妻子在屋外望风都是必备的手段。虽上过几年学，刘良才初读《共产党宣言》也是磕磕绊绊，不得要领。但读得多了，想得透了，再联系起眼前长工与地主、老百姓与县老爷的尖



不过十来年前，位于贵州高寒山区深处的彝族村落岩博还是一个不通路、不通电、不通水，村集体经济为“零”的穷村，全村人均收入不足800元，三分之一的村民越不过那条“温饱线”。

如今，岩博变成全县首富村，全村没有贫困人口，没人外出打工，一多半农户买了汽车，几乎家家都盖了二层小楼。

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竟然和一个嫁进来的女人分不开。

不认命穷，年轻小媳妇非要“折腾”

盘县淤泥彝族乡岩博村共有315户965人，到2001年，这个“三不通”的穷村子里只有老土房和茅草房，洋芋、苞谷是主粮，大米饭只有过年吃得上。

1969年出生的余留芬，20岁初中毕业后嫁到了岩博村。三间用石灰和泥巴捶成的土坯房成了她的新家，之后两个娃相继出生。余留芬的丈夫在外地上班，一个月难回一次，余留芬又要带娃，又要种庄稼。

嫁人之前一直读书的余留芬几乎没种过庄稼，而岩博土地里石头多，不好种也不好挖，地头活成了余留芬最怕的事。

有一年收洋芋时节娃没人带，余留芬只得在地里挖个土坑把一岁多的娃放进去，刨出的洋芋装满一背篓后再把娃抱出来，背上装满洋芋的背篓回家。

前后负重，一天往返五六次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月，余留芬常边走边哭。生活太苦了，余留芬发誓换种活法。1993年她到附近煤矿开了个小饭馆，村里人非议不断：“瞎折腾什么啊？”

余留芬不服气——别人越是这样说，自己越要干得好！

人勤快，头脑活，余留芬把小馆子经营得红红火火。两年后她怀揣几万元回到岩博，在山路公路边建了5间平房。

余留芬买了台照相机扛着串索，照相一块钱一张，村民常排着长队等拍照。她还办过小超市，开小饭馆……折腾来折腾去，到底让自己家的日子越来越好了。

不甘村穷，女支书非要“干出个样子”

余留芬仗义，真诚，村民们大小事都愿意找她。看准了她的能力，乡干部来做工作，希望她出任岩博村支书。



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(资料照片)。

(新华社发)

锐矛盾，更坚定了他依靠马克思主义不懈斗争的信心。

“我爷爷一向对社会不公与压迫气愤难平，总想着乡亲怎么才能活得不那么苦。”刘奎湘说，刘良才告诉家里人听“大胡子”的话，就有饭吃、有田种。慢慢地，刘集村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人越来越多，党组织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强，能够经得住风雨考验。

1931年，为保护在广饶身份暴露的刘良才，上级党组织委派其担任潍县中心县委书记。临行前，他将《共产党宣言》首译本托付给刘集村党支部委员刘考文。此时，大革命失败的中国已被血雨腥风的“白色恐怖”笼罩。在囊括600余种书刊的“禁书名单”中，《共产党宣言》名列榜首，更有人因持有此书惨遭酷刑。

磨难也接踵而来。1932年，广饶的党组织遭到破坏，刘考文被捕。1933年，

因叛徒出卖，刘良才在潍县被捕，随后英勇就义。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首译本的下落，也成了个谜。

人们后来才知道，刘考文在被捕前又将首译本交予为人忠厚低调的党员刘世厚。随后的岁月里，这本书被仔细包裹着，藏在炕洞中、躲在粮囤下、掖在墙眼里，但未曾离开刘世厚的左右。

即便是1945年1月，暴虐的日寇一次性烧毁刘集村500余间房屋时，首译本也得以幸免。已逃至村外的刘世厚那时又返回火场，避开敌人视线，忍受着烟熏火燎，将塞在屋山墙中的首译本安全带出。

烽火年代中的刘集村，被誉为“红色堡垒”，有据可考的烈士就有28人，解放战争中还为前线提供了200人担架队、2万斤军粮等人员物资。今天在首译本的发现地，建有专门的纪念馆，每年来此重

温历史的观众达10余万人次。这段守护首译本的历史还被搬上了舞台与银幕，有更多的人知晓了这段红色历史。

刘集村的后人们，没有忘记近百年来老辈人的坚守与牺牲，更以这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自豪。42岁的刘洪燕从事钢材贸易十几年来，每次结交新朋友，会以“来自刘集”“是一名党员”来介绍自己。“前人的付出才有了今天的认可，我更有底气来维护这一名誉。”刘洪燕说。

“与其他存世的首译本相比，这本56页、巴掌大的小册子得到了农民的认同并在实践斗争发挥了指导作用。”拥有5年解说经历的纪念馆解说员官雪表示，工作中的耳濡目染让自己切实体会到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含义，也深深为党的历程而感动。

文/新华社记者 萧海川 (新华社济南6月19日电)

“女汉子”斗贫记

——贵州盘县淤泥彝族乡岩博村党支部书记余留芬的故事



余留芬(左)和村民在煮酒车间里交谈。

新华社记者 李春惠摄

然而，这个村的“穷”在她心里刻下深深的阴影。

祭山是岩博千百年风俗，每年春耕前全村都要上山祭山祈祷风调雨顺。村里一分钱没有，为了买羊祭山，村干部搬块大石头把山脚的路堵上，过路车要给5元、10元才搬开石头。

自己能带动这么穷的村子致富吗？余留芬也很犹豫。

但骨子里的倔强让她不甘心看着自己的家园如此贫困落后，“要干就干出名堂”，2001年初，余留芬正式接任岩博村支书时暗下决心。

当地少数民族村寨中没有女人当村支书的先例，有一次开村民大会，几个不服气的村民起哄把会给“搅黄”了。

“给我半年的时间，不把岩博干出一个样子，我辞职。”余留芬的倔劲又来了。她要干的第一件事是修路。

修路对居住在半山上的岩博人来说意义非凡，却盼了几辈人都没能实现。

不少人冷眼旁观：村里没有一分钱，况且涉及“征地”，土地都分到户了，谁愿意无偿把地拿出来？

余留芬带头把自家一些地送给被占用土地的农户，又走进有人外出打工、条件相对好的农户家“化缘”土地。

“这一带头带好了，仅7天土地全部

征完。”村民肖本高说。

余留芬垫出4万元买钢钎、大锤、洋铲和炸药，把工作量分到各家。

为省劳动力，余留芬发明了“一人赶泥法”：在腰上系上绳子，绳子两端拴着一块板子的两端，再把板子竖着贴着泥巴，像牛一样把泥巴拉到低的位置垫上。

余留芬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，曾经最怕地头活的余留芬变了，能挖泥巴，能掌钢钎，能抡大锤，如同一个老把式。

3个月，一条3公里长、4米多宽的沙石路竣工。余留芬又带头修了五六条通组路。

不服地穷，余留芬但求村民共同富裕

岩博海拔高，只能生产玉米、洋芋等高寒作物，余留芬想种植价值更高的水果和中药，但试种了很多品种都无法存活，或者有的果树虽然结了果子，但长不熟就烂掉了。

种植这条路走不通，她转而“盯”上一片树林。

当时占地1480亩的岩博林场管理不善，承包人急于转手，为此村里要支付23万元，这可是天文数字。

挨家挨户筹资，只筹到几千元。余留芬又带着村干部“跑单位”，一连跑了12家

都被拒绝，跑到第13家终于借到5万元。

余留芬把自己的5万元也拿出来，钱还差得多，她提议找担保公司借，而每月支付6%的利息让一些人打了退堂鼓。

余留芬想了个土办法，她带着大家来到林场数树，从早到晚数了3个山头，才数到十分之一的面积，林木价值就超过了买林场的价格，大家有底气了！

村支两委通过间伐林木、精心经营，一年就将借款全部还清并盈利16万元。趁热打铁，余留芬带着大家办起了一个又一个村办企业。

用林场抵押贷款，发动村民入股，研石砖厂建起来了，当年产生效益。

用林场抵押贷款，休闲山庄建起来了，当年产生效益。

接着又用砖厂、林场捆绑抵押贷款，特种养殖场建起了，两年后开始赢利……

越来越多的村民摘掉了贫困的帽子，这让余留芬很欣慰，但并没有停下来歇歇。“要把村办企业做大做强。”余留芬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。

这回余留芬瞄准的是村酒厂。

彝家用传统方法煮小锅酒已有600多年历史，早在2004年，余留芬就张罗建起了村小锅酒厂，年产200吨土酒，市场上供不应求。

余留芬说服众人后开始“折腾”，2012年启动酒厂改扩建。她请了四川专家为酒厂扩建做了规划，请了国酒大师季克良做了酒厂顾问，上市公司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参与酒厂扩建。村酒厂华丽转型，正式更名为贵州岩博酒业有限公司，这是盘县唯一的村级股份有限公司。

令村民惊叹的事一件接一件。

上市公司是股东，普通村民也是股东，100多户村民共占股55.10%。

岩博村集体资产上升至5680万元，2015年村民年人均收入达到1.4万元，一跃成了全县首富村。

“没有余支书就没有今天的岩博。”村民们都说。

“人人有事做户户过小康，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事业。”余留芬透露，今年她又为村里争取到一个投资数亿元的旅游项目……

文/新华社记者 李春惠 (据新华社电)

民族脊梁

走近江姐

共产党

感受红

“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……竹签是竹做的，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！”时隔半个多世纪，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，无数游客读到江姐狱中书信的时候，无不被共产党人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感动。

刘帅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。自2001年参加工作，15年来他每天都要为游客讲述在渣滓洞、白公馆里战斗的红岩革命者的事迹，包括人们熟悉的“江姐”——江竹筠的故事。

“做了讲解员后，我对江姐有了更丰满的认识，她不仅是一个女英雄，也是一个妻子，是一个母亲。”正因为如此，15年来，江姐的故事他讲了不少2万次，可每每讲到动情处仍止不住流泪。

1943年，因地下工作需要，江竹筠接受党的指派和彭咏梧假扮夫妻。在革命工作中，两人逐渐建立起深厚感情，于1945年结婚。

此后，江竹筠协助彭咏梧处理了大量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，并以川东临时委员会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，随丈夫一起奔赴川东武装斗争第一线。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，江竹筠将出生不久的孩子送给亲戚抚养。

1948年6月14日，由于叛徒出卖，江竹筠不幸被捕，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。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，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，被捕入狱后，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拷问的对象。

随着刘帅的脚步，记者走进当年渣滓洞的刑讯室，老虎凳、烙铁、皮鞭……各种刑具按照当时的模样摆放在地，令人骇然。刘帅指着一排排斑驳生锈的镣铐说，这些不是仿品，而是解放后从烈士遗体上取下的。江姐所遭受的，是一种叫做“手刑”的刑罚：5根筷子夹住手指，两面用绳子一拉，十指连心，令人痛不欲生。

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15名革命志士中，孙重、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健在。今年清明节时，90岁高龄的孙重依然参加了祭扫烈士活动，这成为他半个多世纪以来雷打不动的一件最重要的事。

孙重说，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处，虽没有亲眼看见江姐受刑，但在放风的时候，他看到江姐走路一瘸一拐，并且手指红肿，像腌萝卜似的。狱友们都知道，江姐受了老虎凳、夹手指的酷刑。

房间很小，没有床，被褥直接铺在地上……这就是当年关押江姐的女牢。重庆夏天潮热，冬天阴冷，很难想象在这样狭小的空间，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是怎样的煎熬。幸存的狱友回忆，江姐由于受刑重，为了忍受疼痛，她只有咬被子，被子的一角都被她咬破了，棉花露在外面。

“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”，对江姐和共产党人来说，什么才是更大的考验？

在渣滓洞一间密室，记者见到了那张令人动容的照片：照片上是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幼童，脸上流露着满满的幸福。这是江姐一家人唯一一张全家福，拍摄于她和丈夫彭咏梧即将前往下川东地区参加武装斗争之前。拍完这张照片，江姐将他们唯一的孩子彭云送给了亲戚抚养，丈夫彭咏梧不久在战斗中牺牲，头颅被敌人砍下悬在城门。

“可以这样说，江姐夫妇对可能的遭遇是明了的，很难想象，照片上面带微笑的他们内心是一种怎样的不舍！”刘帅说，当江姐走向刑场的时候，她把自己的梳子、牙刷、口杯……所有能送的东西都送给了其他难友，身上唯一带着的就是自己儿子彭云的照片。

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，存放着江姐最后一封书信。信纸只有普通手掌大小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，信是写给寄养她儿子的亲戚的：

“假如不幸的话，云儿就送你了，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，以建设新中国为志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。孩子们决不要娇养，粗服淡饭足矣。”

“作为革命者的江姐，虽早已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，可作为母亲的她又希望活下来陪伴儿子成长。可以想象，这种备受煎熬的心情伴随了她在黑牢中的每一天。”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刘和平说。

纵有万般柔情，为了革命胜利，为了人民幸福，可以抛弃一切慷慨赴死——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钢铁意志，这就是革命先烈经受的考验和无畏的牺牲，这就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壮烈历程。

1949年11月14日，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，牺牲时年仅29岁。

如今，每年都有超过600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红岩革命教育基地，感受烈士精神，凭吊烈士英魂。

“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，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死去，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。”刘帅说，江姐书信中说过的一句话，正是以江姐为代表的红岩英烈的生命写照。

文/新华社记者 陈国洲 (新华社重庆6月19日电)